

王蒙 一切都源于最初的青春感动

文 陈颖



王蒙 摄影 刘箐

2018年,王蒙先生受《今晚报》副刊邀请来天津做讲座,作为副刊编辑,笔者与他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那几天,王蒙先生走到哪儿,就把欢声笑语带到哪儿。讲座时,他思维活跃、妙语连珠,现场气氛格外欢快。我们请他去听梅花大鼓。演员清晰的咬字、动听的唱腔,伴奏手沉稳的鼓点、悦耳的琴声,都让王蒙先生频频点头。回去的路上,他仍沉浸其中,打着拍子哼唱,快活得像个孩子。他的快活带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好,有一种年轻人喜欢的松弛感,自然而然地感染着身边人。我想起一部老电影,主人公是一群中学生,生活中不断出现苦恼和困惑,他却总有一种从心底溢出的快活。电影的名字叫《青春万岁》,根据王蒙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屈指算来,王蒙先生已经90岁高龄了。5月25日,《今晚报》副刊将再度邀请王蒙来到天津,做客“海河文化讲堂”,讲述《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届时,读者将有机会再一次感受到这位人民艺术家的灼灼风彩。

少年时什么书都读 通过文学关注社会

王蒙曾在《青春万岁》六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对我那一代人有个出自自裁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的少年时期,赶上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我们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我们赶上点儿啦!”要想理解这段话,需要从源头说起。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京沙滩。他的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同宿舍友有何其芳、李长之。何其芳喜欢小仲马的《茶花女》,男主人公阿尔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给这孩子起名“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字的习惯,去阿存蒙,才有了这个名字。大概一两年后,父母把王蒙带回老家南皮县。

王蒙儿时先是学会了南皮话,到上学时,才接触北京话,所以他的口音更像普通话,而不是北京的原生土话。他会很认真地强调自己是河北省沧州市(原为地区)南皮县澹台乡(今澹台镇)龙堂村人,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那时他在家与父母说的仍是乡话,“我的这些表现似乎是要大声强调,我们的起点是何等的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

王蒙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当过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但时间不长就被解聘了。他家的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至住进“贫民窟”。王蒙喜欢数学,小学时对分析四则文字题的逻辑关系充满兴趣。例如鸡兔同笼,题目里包含着语文的障碍,解题的逻辑包含在叙述之中。到了初中,平面几何使他如痴如醉,他曾写道:“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走出森林……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他爱读书,常到离家不远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冬天,天黑得早,阅览室里煤尽火熄,只剩他一个读者,管理员陪着他不得下班,有些无奈,却也笑嘻嘻地赞赏他。他不仅读了《崆峒剑侠传》《峨眉剑侠传》《大宋八义》《小五义》等章

回小说,还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什么书都读,《绘图八段锦详解》让他受益匪浅,一直会练。最主要的是,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开始认真地关注社会,关注现代文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蒙的民族情、爱国心被点燃了,含泪下定决心——为国家宁愿献出生命。他跳级考中学,一考就中。此时他发现,抗战胜利的兴奋过去了,人们仍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常有“接收劫收”的贪官污吏、美军开车横冲直撞……诸如此类的消息。

被文学与革命感动 他们这代人不可不读

作为一名读左翼著作、唱革命歌曲的进步学生,王蒙在14岁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他开始做青年团的工作。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令他心潮澎湃,他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学成后报效祖国。可上级领导不同意放他走,没办法,但他仍要读书,找来课本自学。他曾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正在期待跑出成绩来的长跑运动员,我绝对不是每小时五公里走路就可以尽兴的。”他在《译文》杂志上读到苏联记者、作家爱伦堡的《谈作家的工作》,那篇文章把文学创作的美丽与神奇写得入神入化。他想,自己有文笔,从小喜欢作文,更要紧的是,有独一无二的少年革命生活,于是在心底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年后初稿完成。如今,这五卷泛黄

的稿纸已成为博物馆中珍贵的藏品,上面一行行蓝色的钢笔字,诉说着青春洋溢的悸动和年轻的心灵遏制不住的热情。

王蒙在《为这一生感动》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是成功者。什么是成功呢?名位吗?金钱吗?我不是化外之民,我在乎人间诸事,但是我确有粪土名位与金钱的记录。我寻求的是感动的体验,或云:将这种体验视为人间走过一趟的重要目标。我走上了文学道路,我走入了革命。因为文学与革命感动了我。”

在七十载的创作生涯里,王蒙出版了百余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多达2000万字的体量,作品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这一切,都源于作家最初的青春感动。年少时自称“长跑运动员”的王蒙,彻彻底底地实践了他对自己的期许——他的作品涵盖长篇小说、新旧体诗、散文评论、文学理论、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他的创作紧扣时代脉搏,主题深刻、风格鲜明,生动反映着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思想变迁、喜怒哀乐、人生百态。

法国《解放报》记者曾采访王蒙,问他为什么写作?王蒙回答:“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我确实不仅仅只是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我坚决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寻常的。我们亲眼看到旧中国的崩溃,我们甚至参加了创造伟大崭新历史的斗争,我们少年年纪便担当起了革命的重任,我们少年年纪便尝到了人生百味历史百图。而时代,历史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如果不写,你留下的是一大历史空白,对于你,对于他和她,对于世界,对于历史。”

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 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当下

王蒙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用他通俗而思辨的语言,把传统智慧讲给更多的人。他在《天地人生》这本书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生。”

2023年,在“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新书发布会上,王蒙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孔孟、老庄、荀子、红楼”,这些著作大部分是他在上小学时读过的,而今仍能当场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竹筒倒豆子般的干脆利落。他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上小学时背过这些。我坚信,不管写得多么高明,文学和艺术都是从生活中来,我相信它们都和生活经验有关系。我都会从文学和艺术里边找出生活来,找出经验来。”

王蒙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契合时代、独有创见,对当下颇有启发性。他能够把古人的记载当成生活经验来理解。比如孔子,他认为,孔子做什么事都恰到好处。他特别喜欢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解释说,孔子认为人不能不义而富且贵,“不义”这个定义是对一个人很严重的责备,但还不能使用刑罚,不能说他有罪,所以孔子说“于我如浮云”,这就是一句批判的话。孔子还有句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意思是说小人要起哄,要证明自

己的存在,小人要闹腾,就如同现在网络平台上呈现的一些现象。

王蒙也曾提及,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你知道西施美了,就知道东施难看了。但是,东施难看,西施没有责任。这就像一个绩优股,大家都去炒,一炒就变成了垃圾股,千万别“皆知美之为美”就往上凑,肯定崩盘。所以,老子说得特别有道理,人生不可避免有美丑的区别、有好坏的区别、有贫富的区别。

谈到庄子,王蒙认为,庄子能做到“心如涌泉、意如飘风”,他写孔子劝弟子不要去魏国说服暴君,写得很有趣,很有社会经验。列子很早就写过机器人,这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让人觉得惊艳。

说到《红楼梦》,王蒙认为,一般红学家强调贾宝玉从小反对儒家的功名、圣贤、进取心,那是没有把《红楼梦》读透,只是从贾府开始,没有从女娲补天开始。俄罗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文学的最大贡献,用屠格涅夫的说法,就是“多余的人”。贾宝玉因为自己无才补天,向隅而泣。他的前身,灵魂是渴望能够为国为民、为祖宗、为家族做贡献的,但他在灵魂上受到不得志、不得用的伤害。无才补天的痛苦是人生的痛苦,是价值的痛苦。

王蒙甚至会把英国著名歌星约翰·列侬与唐朝的诗人李商隐联系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有那么大的魅力,而约翰·列侬的《昨天》也有那么大的魅力?因为昨天有魅力。昨天的魅力在于它像今天一样切近,却像前生一样恒久。诗让人伤感,歌也能把人唱得流泪。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看来,这里面也包括人类文学的共同体,歌曲的共同体,诗词的共同体。”

创作之路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王蒙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改革开放后的《布礼》《活动变人形》,到依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这边风景》,再到解读《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以及《红楼梦》等传统文化经典,他的创作始终离不开生活与人民。其中,《这边风景》生动展现了作家与人民建立的深厚感情,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唯一一享此殊荣的作家。

2023年9月,在中国作协主办的“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上,61卷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出版,同时也揭开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银线’——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展”的序幕。时隔不久,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协、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和“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陆续登场。书籍、报纸、手稿、影像,汇聚成庞大而有序的认知系统,让大众进一步走近了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精神世界。时光不老,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银线”编织日子的人,也会拥有永远青春的青春。



王蒙

著名作家,1934年生于北京,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广泛关注。著有《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百余部(篇)小说。

问:您如何看待人生的抉择?

王蒙: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二战结束了,由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北平军事调遣执行部,中共的代表是叶剑英。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李新,因为有一封历史学家范文澜给我父亲的信,到我家里来,又跟我进行了详谈,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觉得,人生光有勇气不行,还得有历史所给予的机遇。越大的事,我做决定时越坚决。一名地下党人提出发展我入党,我10分钟内就回答:我愿意。上世纪60年代我去新疆,也是10分钟内就做了决定。小事我倒可以磨蹭、犹豫,比如我要换一个眼镜框,以前材质都是赛璐珞的,很便宜,现在有镀金的,有复合金属的,一个眼镜框几千块钱,我可以挑选半天,甚至想下回来再说,这可贵!下了决心。小事拖延三个月、半年都可以,大事我只用10分钟就做出决定。人要敢于挑战自己,敢于做自己没做过的事。

讲述

年逾八旬地毯工匠,传承手工织毯技艺 曾为周邓纪念馆织就《海阔云舒》

口述 周国利 采写 张一然

天津地毯工业底蕴深厚。历史资料显示,1929年,天津有地毯厂和作坊303家,织机2749架,工人11568人。上世纪80年代,天津地毯业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创新设计了一批不失传统韵味,又能适应现代人审美的地毯,占领了国际市场,也诞生了诸多佳作。周邓纪念馆内的《海阔云舒》壁毯,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作。织做这块壁毯的参与者之一周国利,自幼学织地毯,一辈子兢兢业业只干一件事,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少年时到织毯铺当学徒 公私合营后吃上了商品粮

1938年,我出生在武清县(今武清区)崔黄口镇东高坑村。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所以只上了两年小学,13岁经人介绍到天津里学手艺,在解放桥附近、靠近东站的一间裁缝铺当学徒。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路面上都是泥水,我一个人从武清家里出来,搭乘一辆马车往城里走,走了很长时间,终于到达市区,路才算好走了点儿。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学徒还沿

袭了旧社会的规矩,“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傅”,师傅传艺,管徒弟吃饭,没有薪水,三年出师后再给师傅白干一年活。裁缝铺只有一间大平房,几个徒弟晚上睡在“二棚”,就是在屋里靠墙搭起一个架子,放上木板,爬上去睡觉。当学徒很苦,我每天凌晨两点就得起床,生炉子,烧热水,倒马桶,各种杂活都得干。因为我来得最晚,师傅们都能支使我。一直忙到天擦黑,铺子关门,我再把里屋外打扫一遍,才能睡觉,可是睡不了多会儿,也就该起来了。

东家始终嫌我个子矮,不待见我。半年后,没跟我直说,跟介绍人说了,把我打发回家。家里又找人给我介绍了一家织毯铺,在城里唐家口运兴里41号,东家姓张,是武清崔黄口镇人,跟我家一个亲戚同村。介绍人捎话来:“东家说了,不管一个村一个村的,死活也不管,打算在这学,就学。”我认准了进城当学徒,甭管东家说啥,那也得去。

织毯铺一共四张机子,十二个工人。我每天半夜3点起床,给东家买早点送过去,再给师傅们买馒头、浆子,还得盛到碗里,摆好。大伙儿都吃完了我再吃,然后刷碗。接着下门板,打扫卫生,给师傅们打下手,时不



周国利

时还得去东家的家里干点儿零碎活。

1952年公私合营,我进了地毯生产合作社,地址在赤峰道55号,正式开始学织毯。合作社的学徒还是老规矩,但比过去强点儿,每个月给3块钱工资。过去织毯铺管饭,现在给钱,不管饭,我们就去三个小饭铺赊账。早晨吃馒头、大饼,中午吃烩饼,晚上吃棒子面野菜馅的菜团子。每个月关钱后再去结账。但是3块钱不太够花,只能是这家少给点儿,那家少给点儿,到下个个月继续欠。

进了合作社,我就成了正式工人,算工龄,转为非农业户口,吃商品粮,全家人都替我骄傲,全村人都羡慕我。1958年,我调到位于黑牛城道的地毯二厂,因为技术好、经验丰富,当上了管着几百人的工段长。

回归武清崔黄口 以老带新传授技艺

1980年,崔黄口镇与天津地毯公司联合地毯十四厂,地毯公司派人来做企业管理和技术指导,我调到这家企业,可以说是重归故里。当时厂里只有一个车间,有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又招了一批手脚麻利、心比较细的年轻人。一个机台四个人,一个老师傅教四个机台,带着年轻人干边干。

手工织毯技术,点一个点,剪一个头,叫“剪头”。这个好学,会剪头了,照着图纸,一个点剪一个头就行。但这一批地毯织完以后,下次换了新图案,就不会干了,还得再培训一次。如果仅仅会剪头,只能算熟练工,技术含量比较低。

学徒工开始干时一天能织出两三厘米就算不错的,最少得干两年,才能学好这门手艺。如果毛线头插错了地方,就得拆了重织。拆织麻烦,重织更麻烦。一个机台四个人同时织,要是其中一个人织错了,拆掉重织,其他三个人都得等着。因为一个机台的进度必须一样。一旦学成出师,就拿一门手艺,到哪儿都能挣钱。不掌握手工织毯的传统手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

工厂的规模扩大得很快,到上世纪90年代初,厂里已经有六七百名工人了,产品有90道、120道,装饰式栽绒地毯和毯式地毯,商标是“龙湾”“飞船”,主要做外贸出口。效益最好的时候,每年出口创汇几百万美元,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那时候我负责管三工段,有四十多个机台,

后来又负责全车间的质量、技术管理。三工段在天津地毯行业很出名,因为质量过硬,生产的地毯不用检验就可以直接出厂。

1997年7月,我们地毯十四厂承接了一项重要任务——为即将竣工的周邓纪念馆做特大型壁毯《海阔云舒》。这块壁毯长14.35米,高7.23米,原稿由著名艺术家、艺术设计大师周令钊、陈若菊夫妇共同绘制,画面表现了周恩来、邓颖超的革命情怀。我们要用纯羊毛线材质将这幅画编织出来,让壁毯上的白云飘动起来,海浪翻滚起来,对技艺水平的要求非常高。

参观者误以为那是一幅油画 想不到是咱手工织的壁毯

这块壁毯太大了,要分成两块完成,再拼接为一体,做到天衣无缝。在工艺上,要求远近结合、虚实结合、明暗结合,要体现出波浪翻滚、祥云飘逸的立体感,体现出海天一色、浩瀚无际的空间感,还要体现出云海茫茫、缥缈缭绕的整体感。而且,从拿到油画大稿到交付的时间节点,仅有不到四个月,工期非常紧张。

壁毯用色过渡大、色差小,色号超出常规,我们的染纱化验员反复调试,终于染出了近80个生产所需的色纱小样,配制出正式染纱配方。羊毛线的颜色越多,图案就越丰富,但线多了排线时太密,操作难度就更大。织毯车间先后试制了四块样品,大小都是一平方米左右,开始是120道,发现太密了,没法织,最后减到100道。

我们在厂里挑出14名年轻工人,要求是:脑子好、心细、手艺精、干活快、责任心强。这些人需要并排坐在一起,低

着头来回转头、插线,快慢进度、手艺水平,必须一致。光低头干活儿还不行,要一边干一边琢磨,自己干的这个部分合格吗?跟两边的工友织出来的效果衔接和谐吗?比如织白云,脑子灵活的人织出来的白云绝不是这一块大白,那是一块蓝白,旁边一块灰白,而是一点点过渡下来,和天上飘着的白云一样。这是织地毯,其实也是画画。

大伙儿都很清楚这是一项重要任务,也为能参加这项任务感到光荣,干得特别认真。刚开始织时速度很慢,每人一天织三厘米,后面逐渐加快,一天能织三十几厘米了。像我们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看到局部就能感觉到整体效果,会告诉工人,织得不错,颜色过渡很自然,或者是哪里不行,提出来,让他多注意。壁毯的薄厚有明确尺寸,这也是工艺上的要求。另外,比如我旁边的工人织到花纹多的部分,配色编织的难度可能大一些,我就得帮着织,多织出一两寸,行话叫“织宽点儿”,意思是替旁边的工人分担一些。

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了三个多月,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那么大一块壁毯,各部位的衔接都非常自然,好像是一个人工织成的,手法都一样。在周邓纪念馆瞻仰厅,迎面耸立着周恩来、邓颖超的汉白玉雕像,背后正是我们织就的这块壁毯《海阔云舒》,气势恢宏的画面衬托出伟人宽广博大的胸怀。后来听说,很多参观者都误以为那是一幅油画,想不到是咱们天津工人手工织的壁毯。

1998年,我年满60岁,正式退休。这一辈子有苦也有甜,苦在学技术的艰辛,甜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一手过硬的织毯技术,收获了事业和荣誉。有愿意钻研织毯技术的人找我请教,我是会毫无保留地教他们。